

关于经济转向新常态的风险问题

■ 谢明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上接 01 版)

(五)在再分配方面,主要调节手段是税收、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慈善与社会救济、政策调整等。当前群众反映最大、最需要做的,是实行“限高、扩中、提低”的政策,把垄断部门、国企管理层的畸高薪酬及福利适当削减,使之回到合理的区间里来。这些人群的工资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例,应从现在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之悬殊降低到五六倍左右(不久前俄罗斯宣布降低为 7 倍);应提高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外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的超过 70%);应削减国企畸高的福利和管理层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与此同时,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效益的提高,及时提高低收入人群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当然,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绝不是单纯的减薪和涨薪,而是要使薪酬能体现价值、鼓励先进和兼顾社会公平。而要做到这些,研究制订改革方案时必须公开透明,广泛听取意见;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包括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的薪酬分配机制等;必须综合考虑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考虑不同行业之间、管理者与劳动者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不能过大;必须随着国家经济与企业效益的变化而调整薪酬,调整方案应经有关部门批准。

五、外贸增幅连年下降的风险

我国外贸增幅,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12、2013、2014 年外贸增速分别为 6.2%、7.6%、7.4%,都低于当年年初确定的 10%、7.6%、7.5% 目标。其中出口,按美元计价,2014 年同比增长 6.1%,而按人民币计价仅增长 4.9%。虽然我们已经确定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出口对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意义重大,其贡献度一般可达两位数,在解决上亿劳动力就业、积累巨额抗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外汇储备、为国家增加大量税收等方面也功不可没。我国出口企业有 2000 多万家,出口增长连年下降使得它们经营很困难、不少已经倒闭。这个风险亟待解决。

外贸增速放缓的原因,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无法支撑我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拉低了我国进口的增速(2014 年拉低我国内进口气值增速 3.3 个百分点)。从国内看,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和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削弱了我国传统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与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在降温,有的外资企业因本国经济的需要撤回本国,而我国的外贸出口值约有一半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

扭转外贸增速下滑的趋势,必须有新思维新路径:一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而不是“绕过”)国际市场竞争,通过竞争倒逼我国企业大搞创新、把出口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变,倒逼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由“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不久前我国两位学者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出口所引起的竞争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是周边国家“向上提升”的良性力量。这一论断同此前有的外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即:1996~2007 年中国出口引发的竞争在 12 个欧洲国家技术进步中的贡献度高达 15%。对出口对象国如此,对出口国也如此,我们要通过积极发展外贸倒逼出口企业更积极地推进技术进步,只有这样才能更大地加强我们的出口竞争优势。二是不断扩大新的国际市场空间。除大力稳住与 5 大贸易伙伴(欧、美、东盟、中国香港、日本)的双边贸易额外,要大力发展战略多元化,积极拓展与金砖国家、中亚、非洲、拉美的贸易,拓展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同更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要防止“国小不与贸”的想法,小国虽然经济总量小,



但往往有特点有潜力,如自然禀赋好、资金雄厚、地理位置重要、有特殊产品或特殊需求等,与之发展贸易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积极意义。三是积极调整出口结构,实行五个结合:出口货物与出口服务、技术、资本相结合;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相结合;一般货物出口与大型成套设备及技术、标准、服务出口相结合;普通产品出口与大力培育外贸品牌加大品牌产品出口相结合;加快对外贸易与扩大对外投资、扩大国际产能合作相结合。四是深化税制改革,更好发挥税收杠杆的积极作用。为鼓励加大进口,可适当降低进口关税和增设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同时,适当降低过高的消费税、增值税,缩小消费税征收范围,使消费者获得更多的实惠,并吸引庞大的“境外消费”回归为国内消费,从而更大程度地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为鼓励加大出口,可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行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并适当提高退税率、对经营困难的出口企业适当减税等政策。

六、环境资源问题日趋严重的风险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问题日趋严重。目前我国空气、水、土壤、食物等都遭到严重污染,有的还呈持续加剧之势,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我国环境总体趋稳向好”。空气质量,各个省区市都有雾霾,京津冀尤为严重。据环保部发布的《2014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在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检测的 161 个城市中,仅有 16 个年均值达标,不足 10%。《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2013)》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空气质量在全球排名为倒数第二。水,近 80% 的江河湖水受到污染,近乎入海口的排污不达标,61.5% 的地下水水质属较差级或极差级。土壤,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 16.1%,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 31.12%。耕地质量,属中、低级的超过 70%。形势如此严峻,发展下去,势必如美国兰德公司一份报告所预言:中国未来将变成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一方面,环境严重污染;另一方面,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本来就很低,如人均水资源只有 2100 立方米,是世界 13 个最缺水国家之一,人均耕地只有世界水平的一半不到,人均矿产资源也很少,加上因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导致重要资源的消耗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职业病多,食品污染问题大,“大城市病”严重,等等。这个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最紧的约束,或者说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悬崖”,不雷厉风行地加大有效整治的力度就不可能持续下去。这是我们当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风险。试问:我们将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我们还能不能全民奋起紧急行动起来吗?

首先,应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在全民尤其是各级政府官员中牢固树立“环境第

一”的理念,把它列入基本国策,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们一定要摒弃“无工不富”、“有水快流”、“发展经济污染环境不可避免”、“以 GDP 论英雄”、“先生产后治污”、“边生产边治污”等种种谬论,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习近平同志上述指示上来。要在“环境第一”国策的指引下,举国上下,政府、企业、公众一起上,开展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生态、资源不断被破坏的严峻形势,为建成“美丽中国”而努力奋斗。

这场人民战争,政府是主导。政府目前,一要改革环保与资源管理体制。环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保护与合理使用,三者关系非常密切,但目前的状况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九龙治水”、都管都管不好,或者互相推诿、难啃的都不愿啃,而且,问题大但权力小,积重难返又投入不足,以致 30 多年来“三保护”成效不大、积累问题甚多。为此,建议把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及其他部门里的有关业务合并在一起来,组建国家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环资委”),统筹、协调、管理全国“三保护”及其合理利用等工作,其地位和职能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相仿,亦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二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法治成功的关键在一个“严”字。立法要严,没有重典严法无法治污治乱;还要细,不细法律就成为一纸“原则”空文,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司法要严,绝不允许隐瞒案情、干扰办案,谁隐瞒谁干扰就先查办谁;绝不能以罚代法、以行政处分代替法律惩处。执法要严,最严的环保法还要看执行,必须迅速执行落实法院判决,不拖延不走样,不准说情不准擅自减刑,否则法律的权威就丧失殆尽。三是建立一支独立于各部门各地政府之外、直属国家环资委领导的“环资督查队”(俗称“环资警察”),各地设分队并向大企业、重要地区派驻督查员,经常及时如实反映当地环保保护的情况、问题、建议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惩处意见。四是重点建设若干“三保护”样板(例如生活垃圾资源化、废渣废气回收与利用、污水处理与循环使用、煤化气化油、废轮胎再生利用、秸秆发电等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些样板应该是技术先进、效果显著、安全方便、群众欢迎的。过去曾经从国外进口了不少先进的环保设备,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并未发挥作用,应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与处理。五是组织与推动区域协同治污。治理大气和江河污染,必须把相关地区组织起来协同行动。近日京津冀鲁蒙六省区市为改善大气质量,联手在机动车污染、煤炭消费、秸秆综合利用与燃烧、化解过剩产能、发挥性有机物治理、港口及船舶污染、六大重点领域协同治污,这是十分必要的。六是必须加强资源节约与废品回收利用工作。此事讲的多做的少效果差,主要是思想不重视、政策支持少,以致造成“垃圾围城”、

“有水皆污”,资源消耗率畸高等严重问题。现在许多废品无人回收,资源再生利用率、垃圾处理率都比许多国家低很多。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项大事,据有关资料,我国吨煤产出率,只有美国的 28.6%、欧盟的 16.8%、日本的 10.3%;单位 GDP 消耗钢铁,为德国的 4.26 倍、美国的 2.5 倍、日本的 2.32 倍;每增加单位 GDP 的废水排放量,高出发达国家 4 倍;单位工业产值的固体废弃物,高出发达国家 10 倍以上;我国铜、铝、铅、锌四种主要有色金属资源储量,按目前产量计算,将在 3 年~20 年用完。可见,节约资源与废品回收再生利用非同小可,应该由环资委全面抓起来,并给予有力的政策与财政支持。

七是推动各部门各级政府和广大媒体广泛深入地向人民群众进行经常性的生动活泼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从娃娃抓起,幼儿园要讲普常识,小学中学要开设生态文明课,大学、社区、村镇要经常举办生态文明讲座。通过宣传教育与民主讨论,制订有生态文明内容的社区公约、村规民约,并要求党员、干部和家长、老人身体力行,为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作出榜样。

更为严重的是,近几年来,世界政治格局剧烈动荡、小战不断、冲突不止、动乱频发成了新常态,加上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因而使我国面临的现实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增多,主要表现在:

——美国出自其称霸、扩张的本性,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强化对我国的军事围堵,近年又持续对我国施行海空军抵近侦察,并频频伙同某些国家进行针对我国的军事演习。

——在美国的支持、怂恿下,日本军国主义大肆回潮,安倍政府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极力否认过去侵略我国屠杀大量平民的罪恶历史,妄图霸占我国领土钓鱼岛,不断向我国“秀肌肉”和发出战争威胁。

——个别海上邻国在美、日支持下,在涉及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挑衅性举动,在被其非法占据的我国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与资源开发。

——危害我国周边安全的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特别是“东突”暴力恐怖活动升级,“藏独”、“台独”分裂势力也对国家安全与统一构成威胁。

——我国与个别海上邻国尚存在领土争端,这也是一个影响国土安全的潜在因素。

——恐怖活动、海盗活动,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纷争、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有增无减,严重威胁我国的海外利益安全,包括海外能源资源安全、战略通道安全、对外投资与生产经营活动安全、驻外机构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等。

总之,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政治形势比以前更加复杂、紧张,许多安全问题凸显,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 年全球风险报告》所指出:现在,地缘政治的危险性正超过经济和社会问题,国际冲突成为未来 10 年威胁全球经济稳定的最大风险。

针对这样的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对策,既加强国防建设,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坚决捍卫领土与国家利益;又坚持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外交路线,积极开展新型大国外交,搭建了一系列与有关国家的沟通渠道和互相交流、友好商讨的平台;按照“真、实、亲、诚”四字方针和正确义利观,积极发展周边关系和与非洲、拉美国家的关系;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建立丝路基金、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让相关国家搭上“中国顺风车”加快经济发展。我们发挥外汇储备多、掌握高铁等高新技术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帮助对方修铁路、建港口、开运河、搞工业园、改造现有企业,或者给予建设贷款等。我们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参与国际救灾、人道主义救济、医疗等善举,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与信任。我们从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干预别国内政,尊重别国选择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纷争,一贯主张通过和平的办法,对话、协商的办法解决。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主张的善意与决心,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尽管国际风云变幻,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抓紧这个难得的机遇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同时,抓紧准备随时应对各种不期而至的挑战与风险,把问题和困难看得多一些复杂一些,把变工变做得更充分更周全一些,既要大力加强硬实力,更要大力加强软实力,这样我们就能一定能够化解或缓解各种来自境外的政治风险,保护我们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我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世界

触角越伸越长的情况,(澳大利亚希望这么做)帮忙保住澳大利亚作为头号援助国的地位。”

中国并不公布确切的援助项目清单,将



BP:中国能源消费增速下滑

BP 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速度降至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因为这个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的经济正从重工业更多地转向服务业。

这家石油巨头在一份关于全球能源趋势的报告中称,中国经济中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增长水平格外的低,帮助将整个经济的能源消费增速拉低至 2.6%,还不到过去十年平均增速的一半。

BP 首席经济学家斯宾塞·戴尔(Spencer Dale)警告说,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增长异常下跌后,仍有可能出现需求反弹。戴尔说:“随着中国的能源强度向更发达经济体的水平靠拢,我们可能会看到其下滑速度逐渐放缓。”

BP 表示,化石燃料以及可再生能源供需上的重大转变,尤其是美国页岩油气的兴起,意味着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已变得更加突出之际,世界正“目睹全球能源供应商的守护者正在发生某种变化”。

全球领导人正采取行动就碳消费定价达成一个清晰的框架,这有助于控制石油、天然

气和煤炭的使用。BP 行政总裁戴德立(Bob Dudley)对该政策表示支持,他坚决主张石油集团应该在气候变化辩论中拥有发言权。

在戴德立发表上述言论之际,BP 公布了其最新的统计年鉴,该报告被视为能源业的“圣经”,其中包含每个国家在油气生产、消费和储备方面的数据。

戴尔表示,去年中国煤炭需求减速对全球碳排放的喜人放缓作出了贡献。在中国,钢铁和水泥行业是煤炭的重要消费者。戴尔估计,去年全球碳排放仅增长 0.5%,而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2%。

他说:“这个‘1 亿万吨的’问题在于中国发生的这些变化无可能持续下去——若持续下去可能预示着碳排放增长趋势放缓的开端——或者这些变化无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逆转。”

另外,在 2014 年,包括水能、核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在内的非化石能源对全球能源供应增长的合计贡献超过了化石能源,这是 20 年来的头一次。

(FT 中文网)

中国加大对南太平洋国家援助

根据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研究,澳大利亚仍是南太平洋地区的最大外援提供国,但中国正在澳大利亚视为后院的地区挑战澳大利亚的影响力。

2006 至 2013 年间,澳大利亚向南太平洋地区提供了 68 亿美元双边援助,美国提供了 17 亿美元,中国提供了 14 亿美元。但北京方面现在是斐济最大的海外支持者,在上述期间向这个岛国提供了 3.392 亿美元,多于澳大利亚提供的 2.522 亿美元。

在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 8 个南太平洋国家,中国的赠款和贷款正在帮助建造公路、学校和其他基础设施。中国企业正在积极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耗资 16 亿美元的 Ramu 长城。

“在某些特定的太平洋国家,中国提供的援助金额正在比肩澳大利亚和其他传统合作伙伴。”洛伊研究所研究员、报告作者菲莉帕·布兰特(Philippa Brant)表示。

“对太平洋国家的援助之所以没有减少,原因之一可能是,面对中国和其他新兴援助国

其视为国家机密。洛伊研究所参考了 500 个信息来源,包括预算、招标文件、政府声明以及采访。

(FT 中文网)